

宋遗民诗与诗学

王次澄 著

中 华 书 局

引言

宋朝是中国精神与物质文明极度发展的时代,但却国势衰颓,可谓与内忧外患相终始,致使百姓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与忧愤交加的心绪中。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宋与辽、西夏、金、蒙古经过近三百年的南北分治后,终亡于蒙古铁蹄之下。此为历史上第一次汉人为少数民族所统治,士人在理学重视人格建构、道德修持、行志成圣的教化导引之下,呈现了空前庞大的“遗民”群体;同时也造就了遗民历史与遗民文化,写下中国历史与文化史中可歌可泣的一页。

在中国文化史上,“遗民”一词的义界纷纭,常见者约有三种:一是泛指后裔,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①二是指亡国之民,如《左传》闵公二年:“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②三则特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之人,如欧阳询(557—641)《艺文类聚》卷七引汉杜笃(?—78)《首阳山赋》云:“其二老(伯夷、叔齐)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③笔者所采用之“遗民”概念近于第三种,即归庄(1613—1673)在《历代遗民录序》中所谓“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期所遗也”;“故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身之显晦,所以与孔子之表逸民,皇甫谧之传高士,微有不同者也”。^④惟出仕学官,人品高洁,以传扬汉文化为己任者,笔者亦纳入论述范围。

宋遗民所面临的是精神信仰的动摇和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产生对个人、社会和民族前途的巨大忧患与无依感。然而身陷绝境之人,往往更能显示深度的自我,也最能唤起对生存价值的渴望,以及对精神生命的眷顾。因而无论是殉节、隐居,或出为学官,莫不是经由审慎省思人生真谛,并重建“安身立命”信念后的抉择。殉节型的遗民留下无数感天动地的忠义事迹;隐逸及出为学官者则在学术著述、文艺创作与教育传薪方面具有卓越的贡献和成就,树立了后世

① 左丘明撰、晋·杜预注,《左传正义》(台北:广文书局,1972),卷39,页297。

② 左丘明撰、晋·杜预注,《左传正义》(台北:广文书局,1972),卷11,页86。

③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7,页138。

④ 清·归庄,《归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3,页170。

的遗民典范。

宋代遗民中虽不乏名列宋元学案的学者,亦有王应麟(1223—1296)、刘因(1249—1293)、陈普(1244—1315)、熊禾(1247—1312)等大儒,但较缺乏如明遗民中的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等学问博大精深,在当代及后世造成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多数宋遗民的主要兴趣与成就则是诗文创作。钱谦益(1582—1664)于《胡致果诗序》中说“宋之亡也,其诗称盛”;^①全祖望(1705—1755)《宋诗纪事序》论及宋诗之发展与变化,以为遗民诗“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②宋遗民诗可谓是世变下的鲁殿灵光,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枢纽地位。同时遗民传世的诗作是艰辛的心路历程及坎坷际遇的纪录,当具有细读深究的价值。

程敏政《宋遗民录》,为现存最早辑录遗民诗文的集子,共收王炎午(1252—1324)、谢翱(1249—1295)、唐珣(1247—?)、张毅父、方凤(1241—1322)、吴思齐(1238—1301)、龚开(约1221—1305间)、汪元量(南宋度宗咸淳间[1265—1271]进士)、梁栋(1243—1305)、郑思肖(1241—1318)、林景熙(1242—1310)等十一位遗民的作品,^③后之学者多以此书所存录者为研究重心。惟据顾炎武《广宋遗民录序》所记,宋遗民有四百余人。^④虽“遗民”因概念界定不一,而影响人数之多寡,但宋遗民文学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实多,此乃毋庸置疑者。

历代学人及诗文研究者对宋遗民之志节及其作品多持肯定的态度,并给予高度之评价。然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民族概念的转变及全球化的企盼,出现了异于传统的批判。笔者以为文史研究均宜力求还原历史真相,以今论古,或以古议今,均失之客观,甚至偏颇。笔者之研究乃以文献之梳理、考述为基础,进而阐释、评论文学文本及与其相关的内外在问题,并兼而补正前人论述之遗缺与疏失,冀望对宋遗民诗文之研究尽绵薄之力。

此书主要是集结并增补近年已发表的以南宋遗民诗文为主题的系列单篇论文。兹以目录先后为序,简介各篇研究旨趣如下:

《谷音集》和《月泉吟社诗集》是金元、宋元之际和元初逸民、节士群体创作的重要文献,文学史和南宋遗民文学研究的专著中每每提及。目前已有数篇有

① 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18,页800。

②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6,《四部丛刊》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页781。

③ 明·程敏政《宋遗民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史部》册88,页437—553。

④ 清·顾炎武,《广宋遗民录序》,《顾亭林文集》(台北:汉京文化公司,1984),卷2,页33。

关《月泉吟社诗集》的研究论文问世,^①惟《谷音集》似乎相对受到冷落。《〈谷音集〉研析——兼论传统评述之疏失》一文,是就《谷音集》的编者杜本(1276—1350)、《谷音集》的作者群、诗歌内容和风格等方面作深入的考证和探讨,借以澄清若干传统说法的疏误,旨在呈现其真正的特色和价值。《谷音集》作者群的生存年代并不限于宋元之际,且其身份既非遗民,也无法归属于逸民之列,传统文献称《谷音集》为宋遗民诗集,诚失之以偏概全,若称其为金元、晚宋及宋元之际的节士集,则差近事实。此诗集的作品固有反映时代、社会的内容,但传统“野史”之许,或为过誉。伍崇曜氏(1810—1863)将《谷音集》比之《月泉吟社集》;^②王士禛(1634—1711)《论诗绝句》中又将其与元结所辑的《篋中集》相提并论,^③本文乃就作者群、创作动机、诗歌内容和风格等方面,一一剖析比对,说明《谷音集》实与《月泉》、《篋中》不类。

《南宋福建遗民丘葵及其〈钓矶诗集〉》一文,分为:丘葵生平考略、诗集之版本与流传、诗歌风貌与遗民情怀等节论述。丘葵(约1244—1327)名列《宋元学案》中的《北溪学案》,受业于吕大圭(1227—1275),理学造诣深厚,^④是个高蹈固穷、沉潜著述的学者,惜其作品多已亡佚。传统文献对于丘葵事迹记载极为简略,而一般文学史及论述南宋遗民的专著中,亦鲜见其名姓。本文在生平考略一节中,依据文献梳理其里籍、生卒年、学养、隐居生活、人品与著作、家庭背景与身后等。《钓矶诗集》是丘葵唯一存留的文学著作,^⑤惟此诗集书目藏志罕见著录,本文于第二节考述诗集十种版本之刊刻经过及流传,并比较其异同。历来诗评家惯以人品论诗品,各家所撰诗集序文中,对钓矶作品均给予极高评

-
- ① 徐儒宗,《元初遗民诗社——月泉吟社》,《文学遗产》期6(1986年),页40;王次澄,《元初月泉吟社及其诗析论》,《中华文化学报》创刊号(1994年),页135—148;欧阳光,《月泉吟社作者群略考》,《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81—85。
- ② 清·伍崇曜,《谷音集跋》,《粤雅堂丛书》本。
- ③ 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六:“漫郎生及开元日,与世聱牙古性情。谁嗣《篋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独铮铮。”清·王士禛著,惠栋、金荣注,《渔洋精华录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册上,页239。《谷音集·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365,页594,引述王士禛此诗之后两句。
- ④ 参见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台北:世界书局,1983年),页1268;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08—112。案:《续修四库全书·钓矶诗集·邱吉甫先生传》云:“大圭师王昭复”,“王”当为“杨”之误,今从《宋元学案》。
- ⑤ 《钓矶诗集》,(金门:金门县文献委员会,1970年),共存录诗三百零五题,三百四十三首。

价,本文第三节除解析诗歌承传渊源、内容、情怀与写作风格外,特别阐释诗集卷末《警学遗言》中的五十首理学诗歌,以显现其身作为理学家的诗歌创作特色,及其理学思想。

《宋遗民福建大儒熊禾及其诗歌作品析论——兼述诗歌内容之区域文化观照》一文,第一节乃考述熊禾(1247—1312)之字号、家世、生卒年、仕宦、学术承传、治学理念、著作等。第二节叙述熊禾《勿轩集》之刊刻与流传。第三节则分为闽学与朱熹、牧民与行道、儒教与兴学、时事与民生、摹景与悟理、咏物与抒情等六项主题,剖析熊禾诗歌之内容,并兼述其诗歌之修辞特色。第四节是阐释熊禾诗歌内容与区域文化的关联,分为福建地理与历史之记述、闽学之承继与传扬、区域之经济与物产、区域地标景观武夷山等四小节叙述。

熊禾诗歌内容代表了“讲学传薪”类型宋遗民的共同情怀。《勿轩集》中的古体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有别于一般遗民长于近体的特色。^①其诗歌虽多呈现严肃的说教面貌,但涵融幽微的情韵、思致。一般文学史中对理学家之诗歌创作往往以言理不言情之“道学诗”概括之,然若细读吟味,则不尽全然,熊禾诗作即是最佳的例证。

所谓“区域”除具有自然、空间的意义外,还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等元素。因而“地域”应是立体而非平面的概念。空间范围和地理环境是表象,其深层则是风土人情、人文教化、礼仪制度、居民秉性等的综合体现,“群体的意识形态”则是“区域”的核心。本文使用文学文献——熊禾的诗歌作品,述说其区域文化意涵,包括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人文教化、物产经济等层面的点滴,或许是从文学跨领域研究者值得尝试的新方向。

诗集序文向被视为传统文学批评中不可或缺之文献。惟其写作动机、目的、内容和手法与一般诗话、评点及存在于别集、杂记等的其他论诗资料有所不同。主要是此类作品多为撰者应邀而写,不免含有“人情”的虚饰成分,我们是否仍可采用“以意逆志”的方式诠释文本,作为文学批评的论据?再者,序文除文学批评的文献价值外,是否在文学、文人文化史方面也具价值?

《元初诗集序文价值探讨——以卫宗武、牟巘、何梦桂作品为例》一文的撰写,即试图以个案研究,为上述问题寻找答案。

全文以卫宗武(?—1289)、牟巘(1227—1311)、何梦桂(1228—?)三家序题

① 《勿轩集》中之诗歌凡六十八题,一百一十首。其中五古六十三首、五律五首、七言绝句八首、七言联句一首、七言律诗十六首、七言古诗十五首、杂言古诗两首。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册1188,页761—839。

作品之特色、序文诗学见解之意义、序文之文学及文化史料价值等方面,为论述主轴。阅读、诠释传统文献,最常使用的方法是“以意逆志”,此方法是建立在作者“言志”的基础上,但“言志”是写作的崇高理想,而绝非必然。作者即使有心“言志”,惟受主、客观条件的约束,亦往往无法言而由衷。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结构主义思想兴起,对传统采用固定、整合、二元对立的文本解读方法遭到质疑。西方文学理论虽不宜全盘移植运用于中国文献阅读和研究,但往往提供一个回顾、省思及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献诠释和研究方法的机会。本文的探讨,显示卫宗武、牟龢、何梦桂三家序文在文学和文人研究方面的史料价值,似高于在诗学批评上的文献价值。

刘辰翁不仅以忠义耿介享有盛誉,且以卓犖文才见重于学界;同时他还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开风气的诗文评点家。他曾评点过孟浩然(689或691—740?)、王维(唐玄宗开元九年〔721〕进士)、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宗元(773—819)、高适(700?—765)、岑参(715?—770)、张籍(767?—830?)、韩愈(768—824)、孟郊(751—814)、贾岛(779—843)、李贺(790—816)等四十六家唐代诗人的作品,以及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6—1101)、陈与义(1090—1138)、陆游(1125—1210)、汪元量等五家宋代诗人的作品。^①在中国诗文评点发展史上,刘辰翁实居于拓展的关键地位。

综观刘辰翁的诗歌评点,他似乎对慷慨沉郁及清新淡远的诗篇关注最切,但颇令人意外的是,辰翁对以缛丽晦涩著称的李贺诗作也情有独钟。《刘辰翁评点李长吉诗歌研析》一文,乃就辰翁评点长吉诗歌之方式与内容、评语的前承与开拓等方面,予以剖析、探讨,以呈现刘氏诗歌评点的特色及其对长吉诗歌品评与传统见解的异同。论文最后“评语之商榷”一节,是探究刘氏对长吉《残丝曲》、《同沈骝马赋得御沟水》、《雁门太守行》、《蜀国弦》、《帝子歌》、《马诗二十三首》之十三、《昌谷诗》、《上云乐》、《猛虎行》等九首诗歌的评语,并提出个人不同的看法。

《刘辰翁评点陈简斋诗研析》一文,分为:评点方式、范围与内容,由评语探讨刘辰翁(1231—1294)的诗学见解,刘辰翁与方回评点简斋诗的异同等三方面论述,借以呈现刘氏之诗学观、对诗歌评点的奠基之功,以及其品评简斋诗歌的特殊观点。刘辰翁评点陈简斋诗歌有四方面值得重视:其一,刘氏评语未强调其与江西诗派的关联,使读者超脱江西诗派的制约,从一种比较宽广的视角赏

^① 参见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页58。

析简斋诗作。其二,刘氏评点未特意拈出简斋与杜甫的承继关系,杜甫是其创作的终极标的,但并非唯一途径。其三,刘辰翁对简斋伤乱、忧时作品的认同与寄慨,间接说明了简斋诗歌与杜甫沉郁风格的内蕴契合,而非止于成句的点化而已。这是简斋诗歌成就高于一般江西诗人的主要因素。其四,辰翁评点了许多简斋的古体诗,显示出简斋古、近体兼擅的大家风范,而简斋古体诗的创作成就往往为诗家所忽略。凡此,得见辰翁评鹭简斋诗歌的独到之处。

朱熹(1130—1200)于淳熙十一年(1184)赋写了《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后,即广为传读,成为歌咏武夷九曲风景与人文的名篇,当世及后代唱和及仿作者众。南宋道教金丹派南宗第五祖白玉蟾(1194—1229)的仿作,既有承袭,又有创新,展现与众不同的风貌。《邪俗并蓄,情景兼怀:白玉蟾及其〈九曲棹歌〉研析》一文,共分四节论述。第一节“白玉蟾与武夷山”,乃简略考证白玉蟾生平及其与武夷山之渊源。第二节“棹歌之体式与结构”,则是分析十首七言绝句棹歌在格律、押韵上所保留的民歌风味,以及诗歌结构的细致转承脉络。第三节“棹歌中的风光、人文与感兴”,除个别分析十首棹歌的内容外,并综合阐释棹歌所包含的区域文化意蕴,以及所流露的沉郁、顿挫情感。第四节“棹歌的承袭与创新”,乃就结构、修辞、体制、内容、立意和造境等方面,析论白玉蟾棹歌与朱熹原作的异同,并以二者儒、道修养为立论点,诠释两组棹歌在立意和造境上异趣的缘由。

文化的质性由审美的角度而言,可区分为雅与俗两大类,然而雅、俗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稳定、一贯的,而是流转、易变的,二者经常反复呈现“未分化”、“分化”、“融合”等不规则的互动状态。因而在多元需求的社会中,雅、俗文化不能视为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地并存在人类生活的场域中。二者的相辅相成是经由社群智慧、时代精神与大众审美经验的综合协调。传统的诗歌体类“棹歌”,正是雅俗融通、并蓄和相成的具体说明。

《张玉孀及其〈兰雪集〉》一文,旨在探索久被埋没“才比班昭”、“誓死守节”的宋代奇女子张玉孀(生于1253—1258间,卒于1271—1294间)之生平,以及其所著《兰雪集》。全文分:张玉孀其人其事、《兰雪集》及其内容、《兰雪集》的创作特色与评价等三项主题论述。张玉孀的相关史料极少,本文第一节梳理只字片言的文献记载及《兰雪集》诗词作品中所提供的线索,考述其家世背景、爱情与婚配、鸚鵡冢之由来等。张玉孀生平充满戏剧性,尤其经孟称舜将其典范化,编写成《贞文记》传奇广泛流传后,就无人再深究其生平资料的可靠性,本节考证,意在追寻张玉孀其人真貌。第二节叙述目前得见的《兰雪集》六个版本的编

辑刊刻缘起、过程及流传。第三节分析《兰雪集》作品古体胜于近体,刚毅、婉约风格兼备,情境抑郁蕴藉的创作特色,并进而依据唐圭璋等人以为“张玉娘足以和李清照、朱淑真分庭抗礼”的高度评价,^①就风格、内容、造境和遣词、造句等方面,与李清照、朱淑真的作品相比较,印证唐氏所言不虚。

“寻找女性作家”和“建构女性文学传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重要课题。^②近三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及其相关研究已蔚为风潮,但古典女性文学的研究似乎停留在“旧瓶新酒”的阶段,即在研究角度、方法及理论建构上虽具新意,但在研究对象和文本材料方面却鲜见开拓,许多长久以来遭受忽视或埋没的女作家及其作品依然未获得青睐或发掘,《兰雪集》是宋代女作家少数传世的诗词全集之一,其内容的探讨和价值的重新认定,在古典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中,应具有重要意义。

本论文集首三篇为宋遗民诗集的研讨。《谷音集》为一选集,内容涵盖较广,论文叙述的视角较宽,特置于书首。《宋福建遗民丘葵及其〈钓矶诗集〉》、《宋遗民福建大儒熊禾及其诗歌作品析论——兼述诗歌内容之区域文化观照》二文,则以诗歌作者出生时代先后排序。论文集次三篇是属于遗民诗学的相关论述。《元初诗集序文价值探讨——以卫宗武、牟巘、何梦桂作品为例》一文,乃意图以小见大,涉及诗文集序文的价值澄清与诗学文献的采用,故安排于两篇单纯剖析刘辰翁诗歌评点的文章之前;而这两篇研讨刘辰翁诗歌评点的文章则以唐、宋时代先后为序。白玉蟾为南宋道教界的才人,一生求道、行道,其艰苦卓绝之意志,诚可与若干知名的遗民媲美;其别树一格的诗文创作,亦值得研读。张玉娘为宋末贞烈女诗人,虽不属于遗民,但具有“遗民”守节、尚义的人品。有关二人诗作的论述,特置于书末附录。

一般学术研究者较专注于当下与未来学术研究和生涯的进展与规划,而无暇回顾沉思。旧作的结集正给予在学术旅程中的奔驰者一个驻足、反省的机会。或许因知识的积淀与视野的开拓,或许是新资料的发掘与科技的进步,或因岁月的历练与心智的成熟,也或许由于环境的变迁与价值观念的修正,旧有

① 相关论述分见唐圭璋,《宋代女词人张玉娘——“鸳鸯冢”故事的来源》,《文艺月刊》卷6期4;浙江省松阳县文联编,《张玉娘研究资料选编》(丽水:浙江省松阳县文联,1986年),页63、70、69。

② 参阅 Mary Ellmann, *Thinking about Wom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Patricia Meyer Spacks, *The Female Imagination*,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75. Ellen Moers, *Literary Women*,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的研究成果已不能尽如人意,但是检视过去并接受客观意见的自我调整,是“进步”的不二法门。这本论文集仅是过去数年学术耕耘的纪录及宋遗民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野人奏曝,舛误自所难免,淹雅君子,幸有以教之。

王次澄识于2010年岁次庚寅初夏

目 录

引言	1
杜本及其所编《谷音集》	
——兼论传统评述之疏失	1
宋福建遗民丘葵及其《钓矶诗集》	34
宋遗民福建大儒熊禾及其诗歌作品析论	
——兼述诗歌内容之区域文化观照	64
元初诗集序文价值探讨	
——以卫宗武、牟巘、何梦桂作品为例	112
刘辰翁评点李长吉歌诗析论	133
刘辰翁评点陈简斋诗歌研析	156
附	
雅俗并蓄,情景兼怀:白玉蟾及其《九曲棹歌》研析	174
寒冰清澈秋霜莹:张玉孀及其《兰雪集》初探	200
主要征引参考文献	232

杜本及其所编《谷音集》

——兼论传统评述之疏失

前言

《谷音集》和《月泉吟社诗集》是研究宋、元之际和元初逸民、节士群体创作的重要文献，文学史和南宋遗民文学研究的专著中每每提及。近年来已有数篇有关《月泉吟社诗集》的研究论文问世^①，惟《谷音集》似乎尚鲜人问津。本文拟就此集的编者、作者、诗歌内容和风格等方面作较深入的探讨，借以澄清若干传统说法的疏误，并冀望能呈现其真实的特色和价值。

《谷音集》作者群的生存年代并不限于宋元之际，且其身份既非遗民，也无法归属于逸民之列，传统文献称《谷音集》为宋遗民诗集，诚失之以偏概全，若称其为金元、晚宋及宋元之际的节士集，则差近事实。此诗集的作品固有反映时代、社会的内容，但史料价值甚微，传统“野史”之许，或为过誉。伍崇曜氏（1810—1863）将《谷音集》比之《月泉吟社集》，^②王士禛（1634—1711）《论诗绝句》中又将其与元结所辑的《篋中集》相提并论，^③本文乃就作者群、创作动机、诗歌内容和风格等方面，一一剖析比对，说明《谷音集》实与《月泉》、《篋中》不类。

① 徐儒宗，《元初遗民诗社——月泉吟社》，《文学遗产》期6（1986年），页39—46；王次澄，《元初月泉吟社及其诗析论》，《中华文化学报》创刊号（1994年），页135—148；欧阳光，《月泉吟社作者群略考》，《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81—115。

② 清·伍崇曜，《谷音集跋》，《粤雅堂丛书》本。

③ 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六：“漫郎生及开元日，与世聱牙古性情。谁嗣《篋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独铮铮。”清·王士禛著，惠栋、金荣注，《渔洋精华录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册上，页239。《谷音集·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365，页594，引述王士禛此诗之后两句。

一、杜本生平小考

《谷音集》编者杜本，是宋末元初颇知名的逸民，其传记见于《元史》、《元儒考略》、《宋元学案》、《元史类编》等，^①然都颇简略。危素（1309—1372）在《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中，^②对其生平事迹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但仍有不少遗漏之处，今搜罗文史典籍中的有关记载，举要梳理叙述如下：

（一）生卒年、里籍与字号

杜本生于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卒于元至正十年（1350）八月丙戌，享年七十五。其先人居于京兆（直隶，今河北省），后徙天台（今浙江会稽），又迁至临江之清江（今江西清江县），遂为清江人。据危素《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载：“（杜本）父谦，妣邓氏，父在文丞相幕中，毁家以佐军用，父早孤。”^③杜谦的行事为人，必定对杜本具有深远的影响。

杜本号清碧，字伯原，一字原父。案：《元史》及大部分资料皆载杜本字伯原，然夏文彦（1312？—1370？）《图绘宝鉴》、郑元祐（1292—1364）《遂昌杂录》、杨载（1271—1323）《仲弘集·书怀寄杜原父二首》、张翥（1287—1368）《蜕庵集·寄题杜原父怀友轩》等，则以“原父”称之。^④今据虞集（1272—1348）《思学斋记》首句“予始识临江杜伯原父于京师”及下文“闻原甫漠如，一不介意”、“予居忧在临川，原甫使人求告曰”、“原甫高迈绝俗”、“它日受说于原甫而执笔尚未晚也”、“必有复于原甫者”、“以是质诸原甫”等诸语推想，^⑤原甫乃伯原甫之省称，而“甫”通“父”，是古代对成年男子的敬称。“原父”此一省称，通行于文友之间既

① 明·宋濂等撰，《元史》（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卷199《杜本传》，页4477；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册453，页792；清·黄宗羲、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卷85，1106—1107；清·邵远平，《元史类编》，北京图书馆影印室编辑，《辽金元传记资料丛刊》，册5（北京：北京图书馆，2006年），页27b。

② 危素，《危太朴集二十二卷附录一卷》，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册7，页515—516。

③ 以上叙述参见《元史》本传及危素《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

④ 分见清·纪昀等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册1040，页389；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初集二》，页942—94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215，页80。

⑤ 元·虞集，《思学斋记》，《元文类》，卷3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367，页363—364。

久,遂成为杜本的另一字号。由于杜本不事权贵,本性真璞,当时人敬称他为“杜徵君”或“清碧先生”。

(二)学养与著作

杜本学识渊博,望重当时学艺界。元史本传云“本博学善属文”,又云:“平居书册未尝释手,天文、地理、律历、度数靡不通究,尤工于篆隶。”^①虞集在《思学斋记》中对其更是称赏有加:“见其(杜本)博识多闻,心爱重之。间从之有问焉,沛乎其应之无穷也。而其天文、地理、律历、卜祝、神仙、浮屠之说,往往得诸世外之士。至于因人情时物之变,论议政治之术,可指诸掌。”^②有关杜本的学养,史料中皆未详述,但根据零星记载,得知其尤见长于小学、理学和书画,极得时人敬仰。

陶宗仪(1316?—1396?,元末赴考进士落第)《辍耕录》载:“(杜本)有所编五声韵,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化蕃书及国朝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③可见杜本小学知识的广博,并不止于元史本传所谓“尤工于篆隶”而已。惜其所编辑的《华夏同音》早已亡佚,无法一窥究竟。

杜本为道园讲友,《元儒考略》卷三^④、《宋元学案》卷八十五《草庐学案》中皆录其简传^⑤,可证其不可轻忽之理学地位。危素(1303—1372)《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云:

蒋易尝闻于公曰:“先天之学,伏羲而下有邵子,邵子已大段发露明白,蔡元定窥见端倪,近世吴文正公独尝留意,听吴公言不知夜漏之既旦也。”又曰:“邵子其亚圣乎?”^⑥

由此可知其理学渊源来自邵雍(1011—1077),而吴澄(1249—1333)是杜本最服膺的元代大儒,他曾通宵达旦向吴澄问学而不知倦,此亦间接说明杜本的好学和非同凡响的理学造诣。

① 明·宋濂等撰,《元史》(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卷199本传,页4477。

② 元·虞集,《思学斋记》,见《元文类》,卷3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367,页363。

③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10,页126。

④ 明·冯从吾,《元儒考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453,页792。

⑤ 清·黄宗羲、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页1106—1107。

⑥ 危素,《危太朴集二十二卷附录一卷》,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册7,页516。

杜本的书画成就可在明清史料中找到较多的记载,康熙《御定书画谱》卷九十三《明王世贞尔雅楼所藏书法》列有《元名人墨迹》,其中存录赵孟頫(1254—1322)、邓文原(1258—1328)、倪瓒(1301—1374)、王蒙(1301?—1385)等二十六位名家书迹,杜本亦在其内。^①至于杜本的书风,《御定书画谱》卷三十八引元陆友《墨史》云:

杜公书方正严重,如通经巨儒,进止有法。^②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云:

(杜本)工楷隶,楷书结体谨严,全具八法,隶书学汉阳穀碑。^③

明王世贞(1526—1590)《弇州续稿》卷一百六十二评鹭云:

余尝见(杜本)一碑书,极清丽,似吴兴(赵孟頫),第少弱耳。^④

陆友和陶宗仪对杜本书风的品评可相融通,然王世贞却别有看法。“方正严重”和“清丽”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为何两家的评论如此相左?陆友与杜本生活年代相近,必及见杜本书迹,其言应足以为据。而王世贞不仅在《弇州续稿》中明言亲见杜氏真迹,且在《弇州四部稿》跋《杜待制书清真观碑》云:

右赵承旨郡学碑,杜待制清真观碑各一通,并为一帙。杜规摹赵,遂无一笔失度,政犹羊敬元之于小王耳。^⑤

王世贞在《弇州续稿》中所提及之杜本碑书,是否即“清真观碑”,则不得而知,然王世贞目见真迹,并认定杜本学书于赵孟頫,风格神似赵体,是毋庸置疑的,“清

① 清圣祖御定,《御定书画谱》,卷9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20,页517。

② 《御定书画谱》,卷9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20,页517。

③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卷7,页7。

④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284,页345。

⑤ 明·王世贞,《杜待制书清真观碑》,《弇州四部稿》,卷136,页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281,页254。

真”之评当必不虚。然则杜本书风“方正严重”与“清丽流转”皆备耶？或杜本书风应时而变，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书风不同？或“方正严重”为杜本书风本色，“清丽”为兴之所至的仿作？或是与前述相反的状况，“清丽”为本色，“方正严重”为即兴摹拟？

陶宗仪《书史会要》引述《元杜本论书》云：

夫兵无常势，字无常体。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日月垂象，若水火成形，倘悟其几，则纵横皆有意象矣。^①

杜本圆融、通变之书法理论，或可作为其书风多样化的论证基础。由于杜本的书法作品皆未传世，其书风究竟如何，诚难有定论。

杜本不但工书且擅画，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云：“（杜本）画墨牛、葡萄甚可观，亦善山水。”^②《书史会要》卷七载：“（杜本）博该经术，淹贯古今，多藏古图画、器物、名帖。”^③则杜本当亦精于古物、书画之收藏与鉴赏。关于杜本的书画艺术造诣，《元史》本传和危素《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中着墨未多，或当世仍视书画艺术为学问的支流末节之故。

元傅若金（1304—1343）《武夷山雨图怀杜徵君》诗有“可怜卿相多黑头，空谷斯人著书老”之句，^④此当是杜本苦于治学，勤于缮写著述的写照。元黄镇成（1288—1362）曾写《腊八访武夷杜先生，时平章多通遣使致太傅丞相命求所著书，因感今岁两见先生矣》诗，^⑤由此诗题可见朝廷对杜本著作的重视，惜各史料中对杜本著作的记载详略颇有出入。《元史》本传仅提及《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书，^⑥陶宗仪《辍耕录》则论及他所编的《华夏同音》^⑦。《江西通志》卷七十四，杜本简传后案语云：

① 《书史会要》，卷9，页27—30。

② 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5，页1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14，页621。

③ 《书史会要》，卷7，页7。

④ 元·傅若金，《傅與砺诗集》，卷3，页2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213，页219。

⑤ 元·黄镇成，《秋声集》，卷3，页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212，页550。

⑥ 《元史》，卷199，页4477，《杜本传》。明·李贤等奉敕撰，《明一统志》，卷55；季羨林名誉主编，徐丽华主编，《钦定续通志》，卷573，所载同《元史》。

⑦ 《南村辍耕录》，卷10，页126。

所著诗名《清江碧嶂集》，此外尚有《史原》、《历原》、《律原》、《韵原》、《同文正声类韵》等书。^①

引文中述及的《史原》、《历原》、《律原》、《韵原》或为《十原》的部分内容。

对杜本著作和内容叙述较详的是危素所撰《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

所著《四经表义》，即皇帝王伯之学也，《史原》、《历原》，即元会运世之学也，《律原》、《韵原》，即律录声音之学也，《六书通编》，即观物之学也。《类编同文正声类》韵书成，吴公见之曰：天下不可无之书也。盖其大欲以参万化之原，细足以推制作之妙，此其所得者欤？^②

依据陈述口气，似危素曾研读杜氏诸作。惟上述杜氏著作除《清江碧嶂集》外，餘者皆已亡佚，我们无从知其面貌。

《清江碧嶂集》乃杜本歿后，门人程嗣祖所编录。收存诗二十一题，二十五首，顾嗣立《元诗选·清江碧嶂集序》云：

（杜本）平日所作诗，未尝存稿，或问之，笑曰：“亦尝念之，然艺文志所载古人文集，何翅千百，今其存者，百无一二，又有幸不幸焉，故不必存也。”^③

四库馆臣对《清江碧嶂集》中所收录的杜本诗作颇有微词，以为“应酬俚率，殊不称其名”^④。笔者阅读诸诗，亦有同感。惟杜本识见渊博，涵养深厚，虞集、杨载等当时文学名家曾对其推崇备至，史集亦以“善属文”许之，即便吟诗赋词非杜本所长，当不至于篇篇乏味无文如《清江碧嶂集》诸作，是否程嗣祖当时所能搜罗者皆杜本的酬赠劣作？正如杜本所谓“有幸有不幸焉”。明蓝仁（1315—？）《题清江碧嶂集追怀清碧杜先生》云：

平生不受天子禄，老向名山空著书。十年死别如朝暮，一望孤坟泪如

① 《江西通志》，卷74，页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515，页538。

② 《危太朴集二十二卷附录一卷》，《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册7，页516。

③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二》，页1646。

④ 清·纪昀等纂，《谷音集·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365，页594。

雨。往事悠悠叹逝川，遗编零落具尘土。……吁嗟古人多泯没，一字流传风渐歇。高情古调人莫知，夜久长松转霜月。^①

蓝仁的悲叹，正表达了千古后人未能拜读杜本大作的遗憾。

(三)归隐始末

杜本壮年即隐居武夷山，朝廷屡征不起，然决意隐居前，他亦曾面临仕、隐的矛盾抉择。《元史·本传》记其辞官过程说：

江浙行省丞相忽刺(木)[术]，^②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为御史大夫，力荐于武宗，尝被召至京师，未几归隐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时，闻其名，及即位，以币征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脱脱以隐士荐，诏遣使赐以金织文币、上尊酒，召为翰林待制、奏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称疾固辞，……遂不行。^③

由此记载可知杜本首次被召入京，乃于忽刺术(?—1286)入为御使大夫后。《元史·武宗本纪》云：

(至大三年)八月丁未，以江浙行尚书左丞相忽刺出、遥授中书右丞相，厘日，并为御使大夫，诏谕中外。^④

得见杜本首次被召入京，当在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八月之后，据危素《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所言，杜本于忽刺术出任御史大夫后二年入京，则至少应为仁宗皇庆元年。《福建通志》之“杜本”条载“皇庆初御使大夫和哩木荐至京师”，^⑤此可印证上述的推论，杜本时年三十七。据《元史》本传载，杜本此次入

① 明·蓝仁，《蓝山集》卷1，页19—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229，页781。

② 《元史》中，此翻译名字并不统一，或称忽刺木，或称忽刺术，或忽刺出，其他史籍中又有别译，如《福建通志》译为和哩木。本节引文皆保留原书的译法，惟其他叙述文字则一律依照危素《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中“忽刺术”的译名。

③ 《元史》，卷199，页4477。

④ 《元史》，卷23，页526，《武宗纪》。

⑤ 清·金、郑开极纂修，《福建通志》，卷52，页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529，页757。